

台琉璃工房在京展示汉代工艺

从雕塑原型、涂抹硅胶、脱胶，到翻制耐火石膏模、脱模、打磨细修……近日，台湾琉璃工房首度在北京公开展示失传已久的汉代琉璃制造工艺——“脱蜡精铸法”。

“希望这种古老技法能够通过更多人的双手，继续发扬光大。”琉璃工房大陆事业处总经理王秀娟如是解释公开展示“秘技”的缘由。

1987年琉璃工房成立于台湾淡水，创始人曾荣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女演员的杨惠姗和台湾著名导演张毅。

甫一成立，琉璃工房即选定当时只有法国人掌握的“脱蜡精铸法”为主创技术。直到1991年，通过文献交流，大家惊讶地发现，这种“秘技”实际上早在汉代就已

经为中国琉璃工匠所掌握。

“河北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里，著名的金缕衣旁摆着两只翠绿色的琉璃耳杯，可能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脱蜡精铸琉璃器。”王秀娟说。

经历了3年半的失败挫折和7500万元新台币的巨额投入，琉璃工房得以成功复原这项古老技术。

“我们不想把艰难复原的工艺‘雪藏’起来。”王秀娟说，琉璃工房长年致力于推广这项古老却实用的工艺。目前华人地区超过百家以上的琉璃工作室，使用的都是“脱蜡精铸法”。

据了解，这是琉璃工房继1998年在上海公开展示“脱蜡精铸法”之后，第二次在大陆“秀出家底”。 (赵博)

福州“榕都318”文化创意街区开街

福州市主推工业设计的“榕都318”文化创意艺术街区近日正式开街，这已是福州今年正式开张的第三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在福州生根发芽并不断壮大。

“榕都318”街区同北京798艺术区一样，由旧厂房改造而成，318为旧厂房门牌号。街区总面积20.5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现有办公楼及厂房7栋。街区规划有3个功能区，分别为文化创意办公区、作品展示中心(艺术馆)和榕都318光明港艺术园。

文化创意作品展示中心(艺术馆)是街区亮点，用于不定期艺术展示、拍卖等大型活动；榕都318艺术馆是产业链的延伸，街区创意设计成果将在这里定期集中展示、交易。

“榕都318”街区投资运营方相关负责人张永华说，现阶段，街

区已入驻设计类企业16家，完成招商80%，预计正式运营后年产值可超过2亿元。

张永华说，“榕都318”街区今后可以发挥区位优势，与附近海峡金融商务区中高端企业对接，为他们提供企业策划、产品设计等服务。另外，考虑到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优秀，街区也考虑引进台湾企业。

近年来，福州市致力于把当地打造成为引领海西、辐射全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福州市今年5月出台了《福州市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重点发展现代传媒业、动漫游戏业、设计创意业、工艺美术业、文化休闲旅游业、文化会展业以及广告创意业七大文化创意产业，到2012年，福州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以年均25%以上的速度增长，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8%。(郭洋)

悉尼等4城获“世界最佳节日活动之城”

国际节日和活动协会日前宣布了2010年世界节日和活动城市奖名单，新西兰陶波、英国爱丁堡、荷兰鹿特丹和澳大利亚悉尼在4个组别中荣膺榜首，获“最佳节日活动之城”称号。

据国际节日和活动协会网站报道，国际节日和活动协会9月16日在美国圣路易斯的年会上举行了颁奖仪式。世界节日和活动城市奖由各国节日和活动产业界专家组成的评委会选出，将申请参评的城市按人口数量分为少于10万、10万至50万、50万至100万和超过100万4个组别。上述4座城市依次位居各组榜首。

评委会授予陶波的颁奖词说，陶波被誉为新西兰的“节日活动首府”，以举办各类体育、艺术、音乐文化活动而著称，组织者审慎且人性化的管理让陶波的节庆活动有序而富有激情。

英国的爱丁堡是一个历史与创新兼具的魅力城市，借助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新颖的自然人文景观，爱丁堡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有12种之多，其精彩不言而喻。

欧洲第一大港鹿特丹的大型节日活动十分频繁，专业组织者和良好的交通设施让北海爵士音乐节、夏日狂欢节、海港节等活动繁多而不乱，相映生辉。

悉尼是国际知名的现代大都市，遍布城市各处的剧院、画廊、公园和演艺场馆等充分体现了悉尼不息的活力，更是它获得全球认同的重要底蕴标志。

据报道，此次评选的只有亚洲、欧洲、大洋洲和北美地区的申请城市，国际节日和活动协会将于12月就非洲、中东和拉美地区的申请城市评出世界节日和活动城市奖。(欣文)

(以上消息均据新华社)

历史建筑保护的天津说法

——第二届“历史建筑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综述

本报记者 江继兰 侯丽

城市发展给历史建筑保护带来挑战

天津早在1986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它们既传承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同时又是这座城市特色的重要载体。

然而，与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一样，近些年来，天津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做好文化遗产特别是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无法回避、也是亟待探讨的问题。

单霁翔说，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我国各类历史建筑保护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折射出的矛盾异常突出。而在历史建筑保护中遇到的问题尤为急迫，面临的冲击也尤为明显。很多历史建筑群处于城市中心地带，在城市发展空间的巨大需求和土地供给日益短缺的压力下，首当其冲地成为房地产开发拆迁的对象。事实上，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拆除历史建筑、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这对文化遗产保护、对城市肌理和个性特征都带来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本次会议的名誉主席、著名学者冯骥才也认为，我国正在进行高速的现代化建设，历史遗产的保护受到空前强大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冲击，我们一方面要强化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一方面还需要各种不断进步的理念、办法、经验，来解决历史建筑保护的现实问题。

天津保护实践的总结与前瞻

近些年，天津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有效保护了一大批优秀历史风貌建筑。

2005年9月，天津市正式实施《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依据“修旧如故，恢复原貌，安全适用，合理利用”的原则对历史风貌建筑进行保护。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路红从法规体系、保护管理体系、保护技术体系、保护理念、资金体系等方面对5

年来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天津重视邀请公众代表参与历史风貌保护工作，如参与保护项目的论证会议、方案审批、施工监督等环节，在网站上设立公众信箱，在媒体上公示保护名录等，使保护利用项目能够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并参与。“5年来，无论是历史风貌建筑的确认，还是修缮方案的制定，包括对违法行为举报，全市各行业、专家学者、人民群众都积极参与。”

在保护技术体系方面，天津完善了基础信息体系、整修标准体系、科技研究体系3方面内容。以科技研究体系为例，与国内外科院所、大专院校合作，针对保护难题，在历史建筑的消防、结构防震、风格鉴别、人文历史资料的挖掘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研究，并将各项科研成果转化到保护实践中。

路红同时指出，天津在历史建筑保护的技术标准、传统工艺、保护材料、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如目前设计、监理、施工等方面还是套用国家新建建筑标准，对历史建筑的修复不适用。再如天津市的历史风貌建筑常常运用红砖、砂砖、手制青砖等特殊材料，但是如今制作这些材料的原料、工艺正在减少，为今后这类建筑的修繕带来难度。

由于很多传统的修繕、装饰工艺中断了几十年，目前传统工匠非常少，虽然天津较早开展对传统工艺的收集和整理，但还未形成体系。为此，天津今后将加强技术标准的完善、建立传统材料生产基地、建立传统工艺资料库和传统技术人才基地。

对话热点：谨防“冰棍现象”

会议期间，国内同行针对历史建筑保护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

山西省应县木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木塔年久失修，近20年来修护方案一直“难产”。对此，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威表示，要谨防建筑遗产的“冰棍现象”：由于不敢触碰，一些历史建筑就像冰棍融化一样慢慢消失。在现有条件下，应县木塔维修容易出现烂尾，因此修繕方案一直悬而未决。这种“不敢动”的思维使得木塔处于危险之中，政府部门应该

尽快采取措施。

张威指出，“不许动”“不愿动”“不敢动”是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中“冰棍现象”的具体表现形式。一些人认为，历史建筑遗产必须“原汁原味”，甚至强调“只许看不许动”，加以冷冻式的保护，这使建筑遗产得不到合理的利用。不论国际宪章还是国内法律，“合理利用”都是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原则。在可控范围内，要允许合理利用历史建筑遗产的实践。

来自沈阳建筑大学的陈伯超则针对沈阳方城的保护问题与专家们交换了意见。他认为，方城作为沈阳历史悠久的城区、故宫所在地，应对原有的井字街主干系统和“九宫格”空间格局给予保护，不仅仅出于加大气派的意愿，而不顾历史真实性，随意将故宫对面的街坊拓展为大面积的宽阔广场与绿地，也不应假借恢复历史原貌的旗号，重新打造十字形的街道系统，或建造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十字街与井字街的叠加景象。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一座城市历史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世界上

所有城市都面临的难题。今年8月，天津派出代表团考察了法国图尔市几项历史建筑遗产保护的实例。在这次会议上，图尔市市长让·杰曼表示，希望今后图尔市和天津市在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

图尔市位于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卢瓦尔河谷的中心地带，是全法最大的古迹保护区之一。让·杰曼说，重视历史建筑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完美结合，不但可避免城市盲目规模化，还可承担起推进当代文明的使命。对此，天津市与图尔市也交换过一些有关技术性问题的思考。例如，历史建筑的保温隔热，是保护历史建筑区域中的重点改造环节。但因为建筑年代久远，结构脆弱，使得运用在工程中的材料及施工方式受到严格的考验。而且，运用高效的工业框架，来保持历史建筑的外观，似乎未能达到保护历史古迹原貌的标准。

“在当今的市容重建中，避免区域性的整体拆迁政策，无疑将有益于历史建筑融入城市建设中，我们有能力让各种不同时期的建筑和平共存，并保持其所属年代的历史风貌，真实地呈现了

以保存历史来拓展城市的功能，市容中所呈现的历史文化风貌不应成为参与城市历史解读的障碍，而是被认为是激发建筑师野心和灵感的催化剂。”

让·杰曼还认为，探索适合的保护流程和材料，必须在当地寻求解决方案，以适应地区特点的需求，进行“量身定做”。这是开启知识创新及工艺技能的最佳契机，同时还可创造特殊的工艺岗位。

另外，他提到，居民永远不应被忽视。城市改造经常导致住户的搬迁，在这个过程中，建设者应该始终认识到，“公共领域的和谐是关键，以人为本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基石。”

据了解，图尔市将拍摄当地优秀的手工匠人的精湛技艺，并以此建立一个影像资料库，希望能与天津进行合作，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中的传统工艺技术的研究和交流，培养专业人才，为历史风貌建筑的发展充实后备力量。

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也交流了各自的经验。正如单霁翔所言，这次学术会议的举办，为探讨和交流在历史建筑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天津历史建筑——张学铭旧居

老街故事



兵家重地

了解明史的人，都知道“土木堡之变”。公元1449年，在对也先的战役中，明朝50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明朝由此从兴盛走向衰败。土木堡位于今天河北张家口市怀来县东南，隶属宣府镇，而宣府镇是明代长城九镇中的重镇。

张家口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地处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西部的阴山余脉大马群山插入腰间，东连燕山山脉，南接太行山脉北端，从而构成了坝上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自然分界线。中部有桑干河、洋河水系形成的盆地，适合大部队驻扎和运动。从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的间山地最短的隘

明清重镇张家口堡子里

天璐

根据。作为张家口的发源地，张家口堡子里正是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使张文主持建立的军堡。这里修建的时候只有东门永镇门和南门承恩门。现在进出堡子里共有四个通道，西边的出口是后人在城墙上扒开的一个豁口，所以得名西豁子；北门是张家口堡子里建成100年后由万全指挥使张珍开筑的，因为明中后期茶马互市的开通使中国北方出现了安定的社会局面，民族间交流日益扩大，张家口堡子里与长城一线的来往增多，政府决定开筑北门，嘉靖八年(1529年)，指挥使张珍改筑城墙，在北城开一小门。同时从军事防御的角度考虑还是把门开得很小。

既然是屯兵重地，张家口堡子里的构造十分坚固，城堡四角各有一成楼，东南门楼和西城墙上有望瞭和御敌功能的重檐阁楼，堡内有协摆署、中营署、守备署，常年驻扎着为数不少的军队，因此有“武城”之称。建堡之初，守，导致蒙古大军直逼京城。“土木堡之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

所谓张家口堡，人们多会猜测这里最初可能是在张姓家族统治下的军事要塞。这种猜测无不

部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茶马互市”。1571年，六个马市被中国朝廷正式确认为合法边界贸易口岸。在这些口岸，游牧部落可以用他们的马匹换取中原的银两以及其他货物。其中，张家口凭借地理优势，最终成为现代中国和蒙古之间最重要的关口，也是最主要的马市。自此，张家口堡子里开始由单纯的军事城堡演变为兼有贸易功能的边境城市，从而进入了一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

茶马互市

1571年之后的每年春天和秋天，张家口以及其他地方的市场都会开放一个月进行贸易活动。到1578年的时候，这里成为最主要的马市。16世纪的记载表明，在大同和山西的市场都有一个蒙古部落参加，而张家口市场则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蒙古部落以及两个较小的蒙古部落参加。1578年的时候，大约有4万匹马穿过张家口关口进入中原，同时大量的银两、谷物、布匹以及铁质器皿以相反方向流入大草原。40年之后，张家口堡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贸易中心。

城之变

繁荣的经济带来了城市面貌的改变。明末清初，大批豪商巨贾倾巨资在张家口堡内进行旧城改造，精美的豪宅相继出现。几乎是同时，“武城”东边的武城街市也已基本形成。至此，堡子里完成了武城向商业城镇的过渡。

清朝中后期，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业大力发展，张家口堡又成为票号、钱庄的集市。有史可查的金融机构旧址有十五处，甚至还留下了锦泉兴巷这条票号街。随后，张家口堡因其安定雅静的环境，又成为洋行在张家口设置办公机构的首选之地，大批洋人陆续进入张家口。现在张家口堡古堡还有七八处欧式、东洋式建筑遗存。

清末民初，张家口成为京都、天津口岸、华北经济区与西北地区沟通的枢纽，成为北方对欧洲贸易的内陆口岸，其经济贸易活动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张家口堡因商事而发达兴盛。据《张库通商》记载，此时张家口堡成为中外商贾聚集之地，被称为“华北第二商埠”。这里商号、票号、钱庄的投资人与经营者大多是晋商。著名的

祁县乔家大院乔氏家族，在堡子里二道巷开办了宏茂票号。

特殊的地理位置、繁荣的文化、经济交流造就了张家口堡的许多传说，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诸如东门大街32号在康熙年间曾是裁缝铺，相传康熙皇帝曾在此处补过裤子；毗邻的36号院曾是山西商人范永科的大玉川茶社。据说康熙皇帝曾在这座茶楼喝过茶。还有玉皇阁二号院，本是一处山西富商为其儿子结婚盖的宅院，当时张家口堡地价极高，地皮难寻，院子很小。影壁做在了侧墙上，山西人的院子全是单出水，一为防盗，二为增加私密性，还有心理上的希冀，叫做肥水不外人田。雨水进院还要排出去，排水口安了一个铜钱造型，叫做污水排出去，金钱留下来。这类故事在张家口堡不胜枚举。

然而，历史上一度辉煌的张家口，到了近现代却发展缓慢。有市民号称：“十年之前，来个外国人，我们都得赶紧向公安局汇报。”这种缓慢发展和相对闭塞，同样也是因为张家口特殊的地理位置。作为军事重地，有当地史学家如是说：“甚至上个世纪70年代时，柏油路都不能修。为什么？怕给‘敌人’的坦克提供方便。”

作为张家口老城区的张家口堡也逐渐变得冷清。老人们逐渐离去，现在堡子里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过去张家口有句老话“城里有城里的生活，堡里有堡里的生活”，而现在，这儿和外面已经没什么两样。

